

# 蒙元时期敦煌的地理特点与驿站交通

陈光文

(兰州大学 敦煌学研究所, 甘肃 兰州 730020)

**摘要:** 相比汉唐时期, 蒙元时期敦煌作为中西交通枢纽和孔道的地位虽然有所下降, 但仍是东西方往来的重要通道, 常常成为商旅及使臣的重要经由地。蒙古帝国时期修建了自甘州、酒泉、敦煌, 经玉门关而通达西域的站赤体系, 元朝建立后不断予以完善。甘肃行省管辖的三路长行站道、甘肃邻站道, 均连接到沙州、瓜州、哈密等地站赤并进而通往西域, 反映了沙州、瓜州在元代站赤体系中的重要节点位置。站道体系的完善和站赤的正常运转, 不仅保证了元政府和西域地区的经济、政治往来, 也为元政府的信息传达和军事行动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 蒙元时期 敦煌 地理 驿站

**中图分类号:** K247; K870.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6252 (2020) 04-0051-12

蒙元时期, 敦煌在丝路交通上的地理重要性虽然难与汉唐时期相比, 但仍是中西往来的重要经由地, 同时也是元朝与察合台汗国及西方世界政治、经济往来的前沿地区。此外, 蒙元时期修建了由河西通接西域的驿站体系, 敦煌地区成为该驿站体系中的重要节点。关于蒙元时期敦煌的地理特点与驿站交通, 学术界已进行了各有侧重的探讨。大岛立子先生扼要论述了元代敦煌在中西交通中的位置, 探讨了敦煌在元朝边防中的地位作用。<sup>①</sup>胡小鹏先生对甘肃行省内的站赤体系交通道路进行了重点探讨和细致梳理。<sup>②</sup>党宝海先生则对蒙元时期全国范围内的驿站体系和中西交通进行了全面研究。<sup>③</sup>本文在这些研究基础上作进一步的讨论, 不当之处, 祈请教正。

**收稿日期:** 2019-12-23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敦煌通史”(16JJD770024);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明清敦煌区域历史与社会变迁研究”(18CZS055); 兰州大学中央高校“一带一路”专项资金一般项目“敦煌西域与明代陆上丝绸之路研究”(2018ldbryb001)

**作者简介:** 陈光文(1986-), 男, 甘肃兰州人。博士, 副教授, 主要从事敦煌学与西北史地研究。

① [日] 大岛立子《元時代の敦煌》—《東と西を結ぶ道・(一) 敦煌の位置》, 载榎一雄责任编辑《講座敦煌》2《敦煌の歴史》, 東京: 大東出版社, 1980年, 第373页。

② 胡小鹏《元代西北历史与民族研究》, 兰州: 甘肃文化出版社, 1999年。

③ 党宝海《蒙元驿站交通研究》, 北京: 昆仑出版社, 2007年。

## 一、敦煌的地理特点

由于蒙古帝国疆域的辽阔,敦煌不再处于西北边境地区。但在元朝建立后,敦煌实际又处在元帝国与察合台汗国的边境地带。由于元朝疆土大致分为腹里地区和行省地区,因此就元廷中央和内地而言,甘肃行省被认为属于全国“极边之地”。诸如在至大二年(1309)八月中书省臣的上奏中即称“甘肃省僻在边陲”<sup>①</sup>;又如《经世大典·站赤》记载:“本省地在极边,往来经涉沙漠,……人稀路回,所过艰险,比之岭北荒恶尤甚”<sup>②</sup>,对肃州亦记载其为“边远之地”<sup>③</sup>,而瓜州、沙州位于甘肃行省最西部,较肃州更为边远。因此,元代瓜州、沙州又常成为流置犯人的地方。如至元十三年(1276)春正月,王孝忠等人带罪前往八答山采玉。但经过沙州时,火忽反叛使别十八里落入叛军之手,朝廷遂命王忠孝等人在瓜、沙州进行屯田。又如至正十三年(1353)元廷为避免南宋皇室后裔落入起义军之手,而将瀛国公之子和尚赵完普及其亲属迁徙至沙州安置。《元史·顺帝纪》记载至正十二年,河南各地流民打着复兴宋朝的旗帜,元廷监察御史彻彻帖木儿于当年五月上奏,“宜以瀛国公子和尚赵完普及亲属徙沙州安置,禁勿与人交通”<sup>④</sup>。敦煌莫高窟第256窟有汉文游人题记一则,记载:“即是/大宋国/至正十三年六月”。据张小刚先生考证,该汉文游人题记可能与元廷迁徙南宋皇室后裔赵完普等人到敦煌事件有关,题记可能为赵完普或其亲属所留题。<sup>⑤</sup>总之,就元代统治者以及内地而言,敦煌乃至甘肃行省仍是较为偏远的地区。

另外,在元初忽必烈与西北宗王爆发持久战争的背景之下,包括瓜州、沙州在内的河西西部地区成为元朝西北防线的前沿,其军事、政治作用也日益受到重视。元初沙州一带为元朝军队控守的重要地区。如果元军失守,则可能导致敌军顺利进出河西。中统元年(1260)忽必烈即汗位,而驻守在汗国首都哈拉和林的托雷幼子、蒙哥幼弟阿里不哥亦宣布继承汗位,双方随即展开长达四年的激烈战争。由于蒙哥汗之子阿速带前往漠北拥立阿里不哥,其所属军队遂为浑都海所统领。阿蓝答儿、浑都海等意图占据关陇地区,但被按竺弥等联军击败。浑都海败亡后,哈刺不花等被推为主将,率残部经肃州,“及抵沙州北川”<sup>⑥</sup>,涉沙漠返回西域,耶律希亮等随军撤退。由于此前控守畏兀儿河西一线的执必帖木儿的东撤,使沙州地区已无军控守,故而阿蓝答儿残部得以顺利经过沙州而西逃畏兀儿地界。另外,元帝国和西北宗王的激烈战争,也曾使敦煌一度落入

① [明]宋濂等撰《元史》卷23《武宗本纪二》,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513页。

② [明]解缙等编《永乐大典》卷19421,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7235页。

③ [明]解缙等编《永乐大典》卷19419,第7213页。

④ [明]宋濂等撰《元史》卷42《顺帝本纪五》,第900页。

⑤ 张小刚《莫高窟第256窟至正年间“大宋国”题记考释》,《敦煌学辑刊》2003年第2期,第93-95页。

⑥ [明]宋濂等撰《元史》卷180《耶律希亮传》,第4160页。

反忽必烈集团手中。如《元史·暗伯传》记载：“暗伯，唐兀人。……尝迎亲于燉煌，阻兵不得归。”<sup>①</sup> 总之，在元朝与西北宗王爆发战争的背景之下，包括敦煌在内的河西西部地区的军事、政治作用又再度凸显。也正基于此，元初设立了甘肃行省、沙州路总管府及其属州瓜州的行政建置，以加强对这一区域的经营。<sup>②</sup> 同时在河西西部地区确立了以出伯为首的诸王出镇制度。由此，元朝在河西地区建立起有效的军政管理体系，以保证元代西北地区政治的稳定、边防的安全和中西交通路线的畅通。

同时，就敦煌在中西交通上的地理重要性而言，由于蒙元帝国的大一统、草原丝绸之路的兴盛、中西交通路线的多元化以及政治中心的东移北上，蒙元时期敦煌地理位置的重要性相较汉唐时期已经有所下降。诚如日本学者大岛立子先生所指出的，蒙古帝国时期东西方连接陆路交通的主要线路是天山南路或北路，沿此路线东行可直达和林，而没有必要经由敦煌。<sup>③</sup> 当然，东西方往来路线的选择以及是否经由敦煌，往往与战争和政局稳定与否有紧密关系。中西路线的多元化，使得在选择路线时除了经由敦煌外，还可走其他通道，但并非是完全不经敦煌。而且由内地前往西域或者由西域进入内地，穿越河西、经由敦煌仍然是较为便捷的通道。特别是在元朝建立后，统治中心已由和林南移至大都，敦煌仍然是旅行者和其他人员在东西往来时常常选择的经由之地。马可波罗在其于至元八年（1271）开启的东行旅途中，即选择从忽炭（于阗）经车尔成（且末），然后涉沙漠抵达沙州，继而经肃州、甘州并最终抵达元上都（哈拉和林）的路线。元代著名景教徒列班·扫马以及马克西行时，提到经过了“唐古特之城”。关于唐古特之城，英国学者阿·克·穆尔认为“大概是中兴或宁夏，位于黄河岸”<sup>④</sup>，大岛立子先生则指出，从“唐古特之城”出发很快就开始了两个月的于阗沙漠旅行，而沙州到于阗的道路，大概需要两月的时间；同时沙州出去即是沙漠，符合实际情况。故而推测这里的“唐古特之城”可能指的是沙州。<sup>⑤</sup> 笔者同意大岛先生推测，并作补充论述：第一，马可波罗选择的路线是由西向东，从忽炭（和阗）、车尔成（且末），继而经沙州、肃州、甘州并最终抵达大都的路线。而根据《列班·扫马及马克西行记》记载，列班·扫马与马克选择的路线则是由东向西，从大都（北京）、科尚城（东胜），经“唐古特之城”，随后历两个月之久的荒无人烟的沙漠之地而抵达和阗并继续西行的路线。这两条路线大致相同，所谓的“唐古特之城”很可能指沙州，因为只有从沙州出发才可能面临需要走长达两个月时间的大沙漠，而从宁夏地区出发的话则不会立即面临如此漫长的沙漠。《拉班·扫马及马克西行记》记载：“他们从科尚城去唐古特之城。……从唐古特之城他们去洛顿（于阗）之国，历两月之疲乏劳顿，该城是不毛之沙漠，

① [明] 宋濂等撰《元史》卷133《暗伯传》，第3237页。

② 陈光文、郑炳林《蒙、元时期敦煌行政体系述论》，《西北民族研究》2016年第1期，第193-200页。

③ [日] 大岛立子《元時代の敦煌》，载榎一雄责任编集《講座敦煌》2《敦煌の歴史》，第373页。

④ [英] 阿·克·穆尔著，郝镇华译《一五五〇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16页。

⑤ [日] 大岛立子《元時代の敦煌》，载榎一雄责任编集《講座敦煌》2《敦煌の歴史》，第374-375页。

荒无人烟，因其水苦，故播种无收。两僧在整个旅途中，仅有八天时间在费尽体力后找到能引用之甜水。”<sup>①</sup>《马可波罗行纪》中亦多次记载了和阗与沙州间的车尔成、罗不城有苦水，并寻觅甜水的记载，如车尔成州，“所以水多苦恶，然又数处有甘水可饮。……自车尔成首途后，在沙漠中骑行五日，仅见苦水。然更往前行，有一地有甘水可饮”，又如罗不城“沿途尽是沙山沙谷，无食可觅。然若骑行一日一夜，则见有甘水足供五十人或百人暨其牲畜之饮。……别有四处，其水苦恶”<sup>②</sup>等等，皆符合《拉班·扫马和马克西行记》记载的唐古特城至和阗之间地区的特征。第二，根据《马可波罗行纪》的记载，从和阗到罗不城大概需要一个月。从罗不城到唐古忒州穿过沙漠最狭窄处需要一个月时间，而“在此沙漠中行三十日毕，抵一城，名曰沙州”<sup>③</sup>，刚好是大概两个月时间，这与《拉班·扫马和马克西行记》记载的“唐古特州”到和阗的旅行时间基本相符。第三，在《马可波罗行纪》的记载中，原西夏故地中仅称呼沙州为“唐古忒州”，《马可波罗行纪》记载：“此城（沙州）属大汗，全州名唐古忒。”马可波罗之所以称沙州为唐古忒州，大概是因为沙州是西夏王朝最西边的州，也是西方旅行者和商人最早到达的州，因而称其（也可能是沙州居民自称）唐古忒州。因此，《拉班·扫马和马克西行记》中记载的“唐古特之城”，很可能就是沙州。第四，《拉班·扫马和马克西行记》提到唐古特之民是热忱的信徒，思想纯洁，“他们送给两僧各种礼物，……哭泣道：上帝选择你们为他的荣耀服务，愿他与你们同在。阿门”<sup>④</sup>。可见这座“唐古特之城”有相当数量的景教徒。《马可波罗行纪》中还提到唐古忒州（沙州）居民的信仰构成，“居民多是偶像教徒，然亦稍有聂斯托利派之基督教徒若干，并有回教徒”，另外肃州、甘州也有一定数量的聂斯托利派教徒。从这一点来讲沙州符合《拉班·扫马和马克西行记》中记载的唐古特之城的特征。因此，笔者认为列班·扫马和马克的确选择了经沙州而西行的路线。

可以说，虽然蒙元时期中西交通路线已经多元化，但沙州在东西往来中仍然是相当重要的经由地。特别是蒙元时期驿站体系的建立，甘肃行省境内的三路站赤都经过肃州、瓜州、沙州地区而通接西域，敦煌成为了蒙元东西站赤交通的重要节点，因此东西方的旅行家仍然经常选择从西域经沙州、肃州、甘州，再从甘州经灵州等沿黄地区进而到达元都的路线。

① The Monks of Kūblāi Khān, *translated from the Syriac*, by Sir E. A. Wallis Budge, Kr., London, L, pp. 136-139. 关于洛顿，英文本译者威利斯·布哲（Sir E. A. Wallis Budge）认为“疑即和阗，或和田，或于阗，唐古特和喀什噶尔间之一城”。

② [法]沙海昂注、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70、176页。

③ [法]沙海昂注、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第190页。

④ The Monks of Kūblāi Khān, *translated from the Syriac*, by Sir E. A. Wallis Budge, Kr., London, L, pp. 136-139.

## 二、敦煌的驿站交通

蒙古帝国时期开通了纳邻道（小道），即从和林西南前行、越过沙漠至亦集乃的站道。<sup>①</sup> 而从亦集乃出发，经甘州、肃州、沙州，又可通往西域。元朝时期进一步健全了驿站使用的各项规章制度，同时发展了全国性的驿站体系，河西甘州、肃州经由沙州至西域的驿站也更加完善。驿站的设立和完善，不仅使元朝内部联系更加畅通，也加强了元朝与察合台等汗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联系。

### （一）蒙古帝国时期

成吉思汗时期，随着版图的扩大以及军事控制、物资运输、人员往来的需要，开始建立起初步的驿站体系。据《世界征服者史》记载，由于蒙古帝国之领土日渐广大，战事不断，因此“了解敌人的活动变得重要起来”<sup>②</sup>；同时东西方向运送货物，也需要借助完善的驿站体系。在此背景之下，蒙古帝国时期的驿站初步建立起来。窝阔台时期又对驿站制度和驿站体系进行了进一步完善，其中《史集》记载窝阔台时期设立了纳邻站：“从乞台国到该城（哈刺和林），……每隔五程就 [有] 一站。共 37 站”<sup>③</sup>，在各站设一千户进行守卫。纳邻站道从和林西南前行，穿过沙漠戈壁到达亦集乃，而从亦集乃又可连接甘州。同时，从甘州开始，经肃州、瓜州、沙州、哈密地区通往西域的驿站也渐次设立，与纳邻站相连接。

敦煌地区的驿站最早也设立于窝阔台时期。1229 年，窝阔台即大汗位后，命按竺迺为元帅出镇删丹州，“自燉煌置驿抵玉关，通西域，从定关陇”<sup>④</sup>。元代元明善《清河集·雍古按竺迷传》对此有更加具体的记载：“戊子（1228），皇兄命公镇删丹，怀徕新附，置驿张掖、酒泉，至玉关，通道西域，从定关陇”<sup>⑤</sup>，由此可知察合台命部下按竺迷镇删丹，并在张掖和酒泉置驿。胡小鹏先生认为，这段材料表明察合台将此地看作是自己的分地而加以管理，“置驿的目的之一是通西域，即通往其在中亚的领地，将二地联成一片”。<sup>⑥</sup> 此论甚有道理，不过在引用史料时未提及“至玉关”和“从定关陇”两句，而这两句正反映了元朝建立驿站时在“从定关陇”方面的政治、军事考虑。1229 年窝阔台即位之后，对全国驿站人员物资配置予以规定，同时还规定了凭“牌面文字”使用驿站的规章制度。时蒙古军虽已据有西域，但中原地区仍在金朝控制之下。窝阔台即位后，立即着手进行灭金战争。一方面制定蒙古百姓、河北汉民、西域人户交

① 党宝海《蒙元驿站交通研究》，第 59 页。

② [伊朗] 志费尼著，何高济译、翁独健校订《世界征服者史》（上册），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 年，第 34 页。

③ [波斯] 拉施特主编，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2 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年，第 69 页。

④ [明] 宋濂等撰《元史》卷 121《按竺迺传》，第 2982 页。

⑤ [明] 解缙等编《永乐大典》卷 10889，第 4507 页。

⑥ 胡小鹏《元代西北历史与民族研究》，第 62 页。

纳赋调的制度，一方面又“始置仓廩，立驿传”<sup>①</sup>。《元史·按竺迩传》与《清河集·雍古按竺迷传》的记载说明窝阔台设立驿站之举意在打通西域到关中、陇右的联系，以便西域赋调能及时输入前线，支援伐金战事，并稳定陕甘局势。而随着河西地区驿站的相继建立，纳邻站道已可与甘州、肃州、沙州的驿站相连并通往西域地区。这一举措不仅有利于伐金战事，也有利于蒙古汗廷与察合台等汗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联系。

## （二）元朝时期

元朝建立后，进一步发展了全国性的驿站系统。《元史·兵制》记载：“于是四方往来之使，止则有馆舍，顿则有供帐，饥渴则有饮食，而梯航毕达，海宇会同，元之天下，视前代所以为极盛也。”<sup>②</sup> 有元一代，建立了全国范围内发达的驿站体系。太宗窝阔台时，制定了驿站管理的各项规定。世祖忽必烈即位后，对驿站的各项制度又不断加以完善，并对全国驿站进行增设和整饬。但由于元初沙州以西战争频仍，因而沙州、瓜州地区的站赤及其地方行政建制均设立较晚。

《元史·兵制》对甘肃行省站赤的记载亦较为简略，有关站赤内容的记载止于泰定元年（1324）：“甘肃行中书省所辖三路：脱脱禾孙马站六处，马四百九十一匹，牛一百四十九头，驴一百七十一头，羊六百五十口。”<sup>③</sup> 上引《元史·兵制》所载“脱脱禾孙马站六处”，指中兴路下属马站一，永昌路脱脱禾孙马站三，甘州路脱脱禾孙马站二，其中并未包括河西西部地区的肃州、瓜州、沙州等地站赤。《经世大典·站赤》具体记载了至顺元年（1330）时甘肃行省所辖六路脱脱禾孙站赤名称：中兴路马站一个（野马泉站）、永昌路马站三个（本府站、马连泉站、辛记川站）以及甘州路马站两个（本州站、青寺站），并记载了各个站赤的马、牛、驴、羊的配置情况。<sup>④</sup>

胡小鹏先生在对甘肃行省站赤的性质和用途分析后指出，就甘肃行省而言主要有甘肃行省所辖的三路长行站道、纳邻站道以及诸王兀鲁思站道。其中甘肃行省所辖三路长行站道即指中兴路、永昌路和甘州路诸站赤，其东端从中兴府出发，溯黄河南下经灵武、鸣沙抵达应理州，再经永昌府等地到达甘州，然后经由肃州、赤斤、瓜州、沙州等站赤后西南至于阆、西北至哈密。甘肃行省纳邻站道指从中兴府经贺兰山后沙漠到亦集乃路，再经过亦集乃路到沙州附近的黄忽儿玉良等九站，主要为军情传达需要而设。河西西部地区的诸王兀鲁思站道主要指出伯家族镇戍区域内肃州、沙州、瓜州、哈密等地站赤。<sup>⑤</sup> 这一论述正确把握了甘肃行省站赤的基本性质以及特点。需要指出的是，这是《经世大典》《元史》记载至顺元年前后时期的情况，是甘肃行省地区站赤发展到至顺年间时的结果，并非最初的形态。从《经世大典》《元史》等记载并结合元代瓜、沙历

① [明]宋濂等撰《元史》卷2《太宗本纪二》，第29-30页。

② [明]宋濂等撰《元史》卷101《兵志四》，第2583页。

③ [明]宋濂等撰《元史》卷101《兵志四》，第2594页。

④ [明]解缙等编《永乐大典》卷19423，第7257页。

⑤ 胡小鹏《元代西北历史与民族研究》，第244页。

史发展看，笔者认为元初原本直接属于甘肃行省管辖的沙州、瓜州地区站赤，随着鬮王出伯家族及西宁王家族的出镇，逐渐演变为诸王兀鲁思所属站赤。上述甘肃行省境内三路站赤，不管是从亦集乃经小路抵达沙州的甘肃纳邻小道，还是由永昌府、甘州引来的行省所属大道，都需连接并通过瓜州、沙州地区站赤而通向西域，反映了敦煌地区在元代站赤交通体系中的重要节点地位。从史料记载看，尽管肃州、瓜州、沙州、哈密地区站赤演变为诸王兀鲁思所属站赤，但以中书省为代表的元廷中央政府和甘肃行省仍对这类站赤有监察和管理的最高权力，元廷中央和甘肃行省经常对站赤站户逃匿情况进行查勘，并对人马缺乏情况进行赈济补充。由于肃州、瓜州、沙州、哈密地理位置接近，又都具有相似的历史轨迹，因而在论述瓜州、沙州站赤时，亦需对肃州、哈密等地站赤兼作讨论。以下对《经世大典》《元史》等史料中有关元代沙州、瓜州站赤资料进行搜罗梳理，并将其置于甘肃行省、出伯家族镇戍区以及驿站体系的视野之下，依照时间发展和站赤性质演变的轨迹进行论述，并对肃州、哈密的情况也附带讨论。

1260年忽必烈即位后，与阿里不哥展开了激烈战争。河西西部至畏兀儿地本为窝阔台后裔执必帖木儿镇守，但由于遭到阿里不哥军队袭击而东撤，沙州地区一度无军控守。中统二年（1261），元廷在西夏故地置宁夏行省。至元二年（1365）任命董文用经略西夏中兴等路行省，并在中兴、西凉府及甘、肃、瓜、沙等地开垦，开始了一系列建立行政建置、恢复发展生产的举措。中统四年（1263）十月，元廷开始在河西设立驿站，如中兴、西凉、甘州等地。安童等奏“除甘、肃、瓜州，其间合站赤”<sup>①</sup>，很可能是鉴于当时西域战事而未考虑在河西西部地区设站，不过这次设站也为此后元朝在河西西部完善驿站体系奠定了基础。

至元七年（1270），元廷在河西设立肃州路总管府，此时沙州、瓜州尚未复立行政建置。至元十一年（1274）春正月，元廷在沙州之北设立两处陆站。《元史·世祖纪》记载：“立于阆、鸦儿看两城水驿十三，沙州北陆驿二。”<sup>②</sup>这是已知元代沙州设站的最早记录。元代站赤水站使用船，而陆驿则主要使用马、牛、驴，或使用车。是年十月，元廷命各地站赤隶属于所在的各路总管府，“其站户家属，令元籍州县管领”<sup>③</sup>，规定各处站赤隶属于诸路总管府。由于当时沙州尚未设置总管府，沙州、瓜州仍属肃州路总管府管辖，因而沙州地区站赤隶属肃州路，但其站户家属则属沙州管领。至元十七年（1280），元廷设立单独的沙州路总管府，沙州地区站赤开始归于沙州路总管府管辖。

据《经世大典·站赤》记载，至元十九年（1282）五月九日，元廷给扬州行省、甘州行省等发放铺马圣旨，“每省五道内五匹、四匹、三匹各一道，二匹二道”<sup>④</sup>。此时甘肃行省尚称甘州行省，获得铺马圣旨5道。铺马圣旨，是给驿站的玺书，最初为蒙古

① [明]解缙等编《永乐大典》卷19417，第7196页。

② [明]宋濂等撰《元史》卷8《世祖本纪五》，第153页。

③ [明]宋濂等撰《元史》卷101《兵志四》，第2585页。

④ [明]解缙等编《永乐大典》卷19417，第7203页。

字，但由于很多站赤不认识，因而又于铺马圣旨上画上马匹并盖上省印。同年十月，又增给甘州行省铺马圣旨5道。<sup>①</sup>至元二十年（1283）十一月二十日，“右丞相火鲁火孙等，奉准增给甘州行省铺马圣旨十道，通前共计二十道”<sup>②</sup>，自此甘州行省铺马圣旨增至20道。至元二十二年（1285）九月二十五日，尚书忽都答儿等上奏三事，获得批准。其中一事就是奏报甘肃行省沙州、肃州、亦集乃三路由于遣使频繁，而又没有发给圆牌和铺马圣旨，“今乞给铺马劄子六道，合起马一匹，圆牌不须应付。奉旨准”<sup>③</sup>。至元十一年（1274）春正月曾在沙州之北设两处陆驿，但由于至元十九年、二十年分三次给甘州行省的20道铺马圣旨未分给亦集乃、肃州、沙州等地站赤，因而随着三地遣使的逐渐繁多，至元二十二年又给予亦集乃、沙州以及肃州三路铺马圣旨六道。圆牌主要用于紧急军情，“遇军务之急，则又以金字圆符为信，银字者次之”<sup>④</sup>，此次并未给沙州等地圆牌。

至元二十二年（1285），元廷应诸王阿只吉之请于别十八里（今新疆吉木萨尔）设站。由此，从甘州向西经肃州、瓜州、沙州而西至别十八里的站赤体系基本设立完成。至元二十八年（1291），通政院奏报“肃州站赤系边远之地，比年田禾不收，应役烦并”<sup>⑤</sup>。由此可知肃州早前发生了严重的粮荒，通政院请求免于对站户雇佣杂役和向站户购买物品，中书省则指出和雇和买据已有定例，至于其他徭役则下令不向肃州站户征发。根据至元十一年（1274）“命随处站赤，直隶各路总管府”的规定，由于当时沙州路总管府尚未成立，因而沙州站赤隶属于肃州路总管府。至元十七年（1280），沙州路总管府成立，并以瓜州为其属州，沙州地区站赤开始直属于沙州路总管府，与肃州站赤一样为甘肃行省、中书省管理，但当时尚未发现在瓜州设站的记载。值得注意的是，至元二十九（1292）年九月，元廷突将沙、瓜二州百姓迁徙至甘州、肃州两地，“画地使耕，无力者则给以牛具农器”<sup>⑥</sup>，势必对沙州地区站赤产生影响。

大德六年（1302）六月，蒙古军万人进驻瓜州、沙州，并进行大规模屯田。大德六年（1302）十一月，“甘州军隶诸王出伯”<sup>⑦</sup>，出伯开始正式镇戍甘州。大德八年（1304）十二月，元廷任命出伯为威武西宁王，位列三等王，并赐金印。大德十年（1306）四月，元廷命威武西宁王出伯“领甘、肃等地军站事”<sup>⑧</sup>。大德六年出伯始镇戍甘州，大德十一年（1307）进封一等王鹵王并正式移驻肃州，其镇戍地主要在肃州、

① [明]解缙等编《永乐大典》卷19417，第7203页。

② [明]解缙等编《永乐大典》卷19418，第7205页。

③ [明]解缙等编《永乐大典》卷19418，第7210页。

④ [明]宋濂等撰《元史》卷101《兵志四》，第2583页。

⑤ [明]解缙等编《永乐大典》卷19419，第7213页。

⑥ [明]宋濂等撰《元史》卷17《世祖本纪十四》，第366页。

⑦ [明]宋濂等撰《元史》卷20《成宗本纪三》，第443页。

⑧ [明]宋濂等撰《元史》卷21《成宗本纪四》，第469页。按：《元史》原文断句为“命威武西宁王出伯领甘肃等地军站事”，笔者以为“甘肃等地”应断为“甘、肃等地”。



瓜州、沙州地区，因此大德十年起开始掌管上述地区军事与站赤事宜。<sup>①</sup>但甘州站赤一直属于行省，成为属于元代甘肃行省三路站赤的其中一路。而属于幽王驻地肃州及镇戍区域的沙州、瓜州地区站赤，其地方管理机构此前一直属于总管府，自此开始则正式属于幽王出伯所领。但出伯很可能在大德七年（1303）前已经实际领管了肃、瓜、沙等地站赤。据中书省大德七年奏报，诸王、驸马等存在滥用站赤的情况，“以故站赤兀鲁思辈，应役困乏”。鉴于此，中书省臣奏议：“乞今后诸王驸马元帅万户千户，若有给驿之事，未经出伯议者不得行。……但凡不急之务，就令出伯较计。奉圣旨准。”<sup>②</sup>杉山正明先生指出，这里的“站赤兀鲁思辈”可能读作“站赤、兀鲁思辈”，并认为在河西西部地区，出伯家族形成了另一个察合台兀鲁思。<sup>③</sup>我们认为，这里记载的“站赤兀鲁思辈”应指兀鲁思所属的站赤，而材料中的出伯别无他人，即指于大德八年（1304）受封威武西宁王的出伯。在上述史料中，镇戍诸王、驸马不顾站赤规定，给予王位下万户千户等铺马并使其频繁使用站赤，造成出伯兀鲁思属下站赤出现了“应役困乏”的情况。中书省臣鉴于此种情况，提请进一步严格驿站使用制度，诸王、驸马等必须经过出伯同意方可使用驿站。《经世大典·站赤》的这段记载在《元史》中亦有反映，但有所删减，《元史·成宗纪》记载大德七年（1303）二月，“命诸王出伯非急务者勿遣乘驿”<sup>④</sup>。总之，这两段记载表明，第一出伯兀鲁思已经形成，出伯成为元朝西北地区的军事统帅，肃州、沙州等地站赤开始转化为出伯兀鲁思领有；第二当时诸王、驸马等存在过度使用出伯兀鲁思下属站赤的情况，造成了站赤的困乏；第三元廷再度规范出伯兀鲁思下属站赤的使用规定，进一步确认了出伯对站赤使用的决定权，同时也对出伯有所限制，表明出伯虽然“独当一面，权高位重”，但仍受元廷中央节制。

大德七年（1303）五月二十八日，元廷下令追查甘肃隐占站户，并令站户恢复当役。经过中书省及枢密院、宣政院的调查，发现甘州甘泉站原有的348户站户仅存101户，有多达126户站户隐匿于诸王投下。<sup>⑤</sup>实际上甘肃行省各地站赤一直存在站户逃散和隐匿的情况，早在至元年间由于河西地区站赤运转繁忙，加之政局复杂、战争时有祸及，尽管元廷采取多种措施对驿站使用加以规范，但甘肃行省站赤仍然面临着站赤困乏、站户逃匿情况。本来由行省管辖站赤，站户却逃离站赤而依附出伯之下<sup>⑥</sup>，直接导致了应役站户人数的减少及站赤使用效率的下降。又如至元二十七年（1290）八

① 关于出伯家族世系及其历史，参看〔日〕杉山正明《モンゴル帝国と大元ウルス》，京都：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04年；胡小鹏《元代西北历史与民族研究》，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9年；〔日〕松田孝一《元朝的分封制度——关于邠王（幽王）出伯与邠州的关系》，载《中国多文字时代的历史文献研究》，北京，2008年。张海娟《蒙古幽王家族与元代西北社会》，西北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陈光文《元代诸王出镇敦煌相关问题新探》，《敦煌学辑刊》2017年第2期。

② 〔明〕解缙等编《永乐大典》卷19420，第7222页。

③ 〔日〕杉山正明《モンゴル帝国と大元ウルス》，第319页。

④ 〔明〕宋濂等撰《元史》卷21《成宗本纪四》，第448页。

⑤ 〔明〕解缙等编《永乐大典》卷19420，第7222页。

⑥ 〔明〕解缙等编《永乐大典》卷19417，第7199页。

月一日奏：“甘肃行省言甘州两经抄籍，站户计一千六百余户。中统元年，直浑都海军兴，逃散及金充秃鲁花并僧人诸色隐占处，实有一百六十二户当站，……将各投下及诸人隐占站户，回付当站，似望官事协济。”奏旨若日，前者朕今传命收拾，已行文书问于属吏可知矣。独生钦遵，移文施行讫。”<sup>①</sup>当时浑都海部谋据关陇，但被按竺弥等联军击败而亡，其余部在哈刺不花带领下经肃州、沙州而逃往西域。但此次兵乱导致甘州地区站赤仅余 162 户站户当站，逃散及隐匿站户占了近十分之九，大量站户逃匿至出镇诸王之下，站赤实际已经难以正常运转。故而元廷下令逃匿站户回到站赤继续应役。虽然元廷对站赤运转和使用规定不断整饬和规范，但站户逃散及隐匿于诸王之下的情况却一直存在，并且这种情况在元代中后期伴随着站赤制度的废弛而愈加严重。

皇庆元年（1312），哈密至沙州之间军站贫乏，元廷遣使赴甘肃行省追查站户，并金补民户百姓为站户，但未见效果。《经世大典·站赤》记载：“今军当站至甚贫乏，……已尝遣使至甘肃行省督令追复元户，有阙则金补百姓，未见回报。”<sup>②</sup>这些站赤最初都是民户当役，后来由军人当站，所有马羊帐房等物资皆由军人出，故而此类军站都出现了贫乏的情况。针对这种情况，出镇哈密的合班之子诸王宽彻及其王傅官等，只能进行拨款赈济，遇到诸王驸马使臣人数多而马匹不够时，还需蒙古军人增置。当蒙古站户逃散或不足时，则令甘肃行省与诸王（嗣幽王）南忽里、诸王宽彻追收蒙古站户，并令其复役。

皇庆二年（1313）十月十四日、二十三日中书省两次奏请委派武备寺的阿八赤赴任诸王宽彻位下站赤的脱脱禾孙，专门负责监察使人真伪及是否违规乘驿。<sup>③</sup>这表明虽然军站属诸王位下提领，但其站赤仍属元朝驿站体系的一部分，元廷中央有权力进行监察和管理。对于河西地区站赤因站户逃散和隐匿而造成的贫乏，元廷除了整饬和规范外，还需经常性的调拨人马赈济。

延祐元年（1314），中书省与幽王南忽里就金补民户问题发生争执。据《经世大典·站赤》记载，中书省鉴于察巴站等西川边地站赤军人不足，意欲从瓜州、曲尤、沙州等地抽调人户补入，但遭到南忽里反对：“云属本位下种田户，有司不得侵犯”<sup>④</sup>。曲尤，据李正宇先生考证在今酒泉以西的玉门镇以东二里之古城；察巴站，据胡小鹏先生考证在今瓜州县桥湾堡，察巴站往西即至瓜州、沙州。<sup>⑤</sup>可知曲尤、察巴站皆在南忽里镇戍区域。中书省奏请于曲尤、沙州、瓜州上户内金补 100 户充察巴站役，激起了南忽里的反对，将所金站户内属于自己位下的种田户带走。但最后中书省仍下令将金补民

① [明]解缙等编《永乐大典》卷 19418，第 7211 页。

② [明]解缙等编《永乐大典》卷 19420，第 7228 页。

③ [明]解缙等编《永乐大典》卷 19420，第 7229-7230 页。

④ [明]解缙等编《永乐大典》卷 19421，第 7232 页。

⑤ 李正宇《“曲尤”考》，载《丝绸之路民族古文字与文化学术讨论会文集》（上），西安：三秦出版社，2007 年，第 489-498 页。胡小鹏《元代西北历史与民族研究》，第 242-243 页。

户照例充察巴站役，表明即使是诸王镇戍下军站，元廷仍拥有对这类站赤的最高管辖权和调配权。是月，有四支灭吉怜部众为了逃避战役而自称属于阿八赤或昔宝赤，南忽里奏请将这四支灭吉怜部众安置于驿站当站，补充站户。元廷同意其请，“宜从彼省与南忽里差人收聚，悉令当站。奉圣旨准”<sup>①</sup>。答失城即塔失城，属于诸王宽彻位下站赤。特木勒先生指出，灭吉怜部是游牧于哈密、巴里坤、塔失城和亦集乃一带历史悠久的游牧部落，四支“灭吉怜民”中有部分人以充当南忽里位下的昔宝赤（siba' uci，鹰夫）和阿八赤（abaci，猎人）为借口而逃避站役。”<sup>②</sup>南忽里主动奏请中书省令这四支灭吉怜部承担站役，同时鉴于灭吉怜部散处各地，又着甘肃行省与南忽里收聚灭吉怜散部，命其全部当站应役，以保证站赤站户的稳定。

延祐元年（1314）十月，中书省进一步规范甘肃行省内站赤的使用规定。《经世大典·站赤》记载：“甘肃纳邻站，系蒙古军人应当，专备军情急务，其余非关系要、但悬金银圆牌，往往取便经行，若不禁止不可。”<sup>③</sup>其中的“甘肃纳邻站”，是从中兴府经亦集乃路取道沙州的小路，专门为军情传报需要，而兀鲁思两道指河西西部地区出伯家族所立的站赤以及河西东部地区阔端所立站赤，汉站则指今甘肃东部和陕西地区站赤。<sup>④</sup>此次中书省进一步严格驿站使用制度，严格规定甘肃纳邻站专为军情急务所用，普通使人不得使用。至于出使人员则均可利用兀鲁思两道站赤和汉站，而从西域运送葡萄酒的使人则走河西各地站赤，经甘肃东部和陕西汉站抵达元都。这一规定进一步明确了甘肃行省境内军站和普通站赤的功能区别，并明晰了不同类型站赤的使用规定。

延祐元年（1314）十月二十七日，中书省又奏议于沙州、瓜州设立屯储总管万户府，“掌莅屯田公事，请给差使铺马圣旨。内起马二匹者二道，一匹者四道，奉圣旨与之。”<sup>⑤</sup>瓜沙屯储总管万户府的设立，加大了对当地的垦种力度，同时设立仓库屯储所产粮食并拨给周围地区站赤，力图从根本上保障站赤系统的稳定。同年十二月三日，中书省奏：“通政院言纳邻一道二十三站，人户阙食，请接济事。……近仓者给以米粟，去仓远者，量价给钞。”<sup>⑥</sup>在建立屯储总管万户府的同时，还在曲尤设立了仓库以存储瓜沙产粮。中书省及甘肃行省官员首先对纳邻道站赤的户数进行勘合，并规定按照纳邻道站赤离曲尤仓的远近进行区别对待，离曲尤仓近的直接拨付粮食，远的则根据粮食当时的价格拨付相同钱款。这一举措相对灵活，发挥了瓜沙产粮基地的作用，保证了站赤系统的粮食供给。

元廷在瓜沙地区设立屯储总管万户府，并建立粮仓，一方面保证了军队需求，一方

① [明]解缙等编《永乐大典》卷19422，第7232页。

② 特木勒《元明时期 Mekrin 部史事考》，《民族研究》2015年第1期，第83页。

③ [明]解缙等编《永乐大典》卷19422，第7232页。

④ 胡小鹏《元代西北历史与民族研究》，第239-243页。

⑤ [明]解缙等编《永乐大典》卷19422，第7232页。

⑥ [明]解缙等编《永乐大典》卷19422，第7232页。

面也确保了甘肃纳邻站道和南忽里、宽彻兀鲁思军站的稳定运转。《元史·仁宗纪》记载：“[至大四年四月]命中书省赈济甘肃过川军。”<sup>①</sup>黑水城出土写于延祐二年(1315)的M1·0267[F116:W561]《军用钱粮文卷》文书中多次出现了“暖忽里入川”“暖忽里幽王入川”的记载。据李治安先生考证,这里的“川”应为瓜州、沙州及曲尤以西通往哈密力的戈壁石川,文书记载了暖忽里幽王自沙州前线就近进入哈密力附近塔失八里站、揽出去站一带的戈壁石川、进而向西进攻察合台汗国的事件。<sup>②</sup>由此可知,上述延祐元年元廷的一系列集中整饬站赤、补充人马粮食的举措,应与元军针对察合台汗国的军事行动有关。这些举措反过来又最大程度的发挥了站赤的作用,支持了元军军事行动的实施。《经世大典·站赤》以及《元史》对甘肃行省境内站赤的记载分别止于至顺元年(1330)和泰定元年(1324),因此对此后沙州、瓜州的站赤以及站赤体系无法作深入探讨。

### 三、结语

总体而言,相比于前代,蒙元时期虽然敦煌作为中西交通枢纽和孔道的地位有所下降,但仍是东西往来的重要通道。特别是元朝在与察合台汗国及西方世界的往来中,敦煌常常成为商旅及使臣往来的重要经由地。蒙古帝国时期修建了自甘州、酒泉、敦煌,经玉门关而通达西域的站赤体系,敦煌地区最早的站赤即设立于窝阔台时期。元朝建立后,进一步完善站赤体系。至元十一年(1274)春正月,元廷在沙州北设立两处陆站。最初这些站赤均属于沙州路总管府,并由中书省、甘肃行省进行监管。但随着出伯家族对肃州、瓜州、沙州、哈密地区的镇戍,上述地区的站赤逐渐演变为出伯兀鲁思下属站赤。尽管如此,中书省等元廷中央机构仍拥有对出伯兀鲁思站赤的最高管辖权。甘肃行省所管辖的三路长行站道、甘肃纳邻站道,均接到出伯家族兀鲁思的沙州、瓜州、哈密等地区的诸站赤,并进而通往西域,也反映了沙州、瓜州在元代站赤体系中的重要节点位置。从《经世大典·站赤》和《元史》的相关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甘肃行省诸站赤,特别是位置偏僻、条件艰苦的出伯兀鲁思下站赤和甘肃纳邻站道,经常发生站户逃匿以及站赤困乏的情况。同时也可看出元政府进行勘合站户、赈济粮食、拨付钱款等为确保站赤稳定运行而所作出的努力。站道体系的完善和站赤的正常运转,不仅保证了元政府和西域地区的经济、政治往来,也为元政府的信息传达和军事行动奠定了基础。

<sup>①</sup> [明]宋濂等撰《元史》卷24《仁宗本纪一》,第542页。

<sup>②</sup> 李治安《元中叶西北“过川”及“过川军”新探》,《历史研究》2013年第2期,第37-40页。